

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立及其活动

韩磊^{1,2}, 薛丹¹

(1.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2. 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2)

摘要: 1997年10月美国国务院与国会议员达成妥协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2002年西藏政策法》明确规定了这一职位的职责范围,使其成为国务院中常设的制度化职位。克莱格等4位协调员在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接触商谈、关注境外藏人难民事务、提交涉藏事务报告等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美国对西藏事务干预力度明显加强。

关键词: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2002年西藏政策法》;葆拉·杜布里安斯基;玛丽亚·奥特罗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3-0217-06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以下简称“协调员”)是美国国务院于克林顿政府后期设立的一个带有明显干涉中国内政色彩的职务,历任协调员对达赖喇嘛集团持支持的立场。随着《2002年西藏政策法》(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的签署,协调员的职责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其活动日渐活跃,对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继续保留了这一职务,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政策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本文依据美国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府报告、美国国会听证会等记录分析协调员的产生及其主要涉藏活动。

一、“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立

美国国务院原本没有“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该职务缘起于将人权列为外交政策目标之一的克林顿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特点是将促进民主与促进人权结合起来,以“人权”为旗帜,加大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反映在“西藏问题”上,美国以关注西藏人权为借口,加强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力度。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急需一位专职人员来负责西藏事务。

协调员的出现同时也是美国国会干预“西藏问题”

的产物。作为官方的政策,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政府就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达赖喇嘛在国会许多支持者,这些支持达赖集团的国会议员不仅主张在法律上给予“西藏流亡政府”更高的法律地位,而且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政府做出有利于达赖喇嘛的政治让步。在国会的压力下,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在任内都会见了达赖喇嘛。

克林顿政府初期,美国国会开始考虑设立大使级别的美国西藏特使(U.S. Special Envoy for Tibet),积极推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对话。1994年参议员佩尔(Claiborne Pell)介绍这一职位时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涉藏问题:“我想起在前几届政府中,要想与中国进行一场关于西藏问题的严肃、有见解的谈判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设立西藏特使可以确保西藏问题——这一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可以持续不断地出现在高级级别的政策谈判中。”^{[1][3]}

在第104届国会上,以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前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本杰明·A·吉尔曼(Benjamin A. Gilman)为代表的、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议员提出了《1995年美国海外利益法》(American Overseas Interests Act of 1995)议案。这项议案中涵盖了设立西藏特使的条款,规定西藏特使应当为大使级别,其职责是积极推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但是,1996年4月12日,克林顿总统否决了这项议案。总统之所以否决它,是因为自从

收稿日期:2012-10-10;修回日期:2012-11-07

作者简介:韩磊(198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史,涉藏问题;薛丹(1983-),女,宁夏银川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史,涉藏问题。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设立大使级别的西藏特使相当于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恶劣的负面影响。^{[1](5)}4月30日,国会试图推翻总统的否决,但是没能获得2/3的多数票。

主张设立西藏特使的议员并不甘心失败。1997年6月3日,在美国第105届国会上,《1995年美国海外利益法》被三个单独的法案所取代,这三项法案分别是:H.R.1757,授权在1998至1999财政年度为国务院拨款、H.R.1758《欧洲安全法》(European Security Act)、H.R.1759对外援助授权与改革法案(a foreign aid authorization and reform bill)。其中,第一项法案包含了设立西藏特使的内容。^{[1](5)}国会利用手中的拨款权向国务院施加压力。面对来自国会的压力,1997年10月31日,美国国务院做出了一个向国会妥协的举动,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与高级成员之间达成一项共识:在国务院内委任无大使级别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协调员的主要任务是与“西藏流亡政府保持联络”,^{[2](129)}同时关注人权事务,促进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以及协助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

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责演变

不难看出,协调员的设立是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在西藏问题上不同策略相互妥协之产物,这使得协调员在出现之初带有很强的过渡性与临时性,其具体的权限与职责并没有被明确下来。协调员在关注西藏问题的同时,经常被其他的事务牵扯精力,其活动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格里高利·克莱格(Gregory Craig)担任美国国务院第一任协调员。但在1998年秋,因莱温斯基事件,国会开始启动弹劾克林顿总统的动议。为了度过政治上的困境,克林顿启用政治经验丰富的克莱格为特别顾问来应对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质询,这使克莱格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无暇关注西藏问题。同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于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巴德尔(Bader)被任命为驻纳米比亚大使,因此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有限。1999年1月20日,负责人口、难民、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朱丽亚·塔夫脱(Julia Taft)继任协调员。但是年春100万阿尔巴尼亚难民涌入科索沃,由于忙于应对这场危机,塔夫脱没有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关注西藏问题。

这种状态在国会通过《2002年西藏政策法》并经总统签署生效后得到改善。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兰托斯、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亨利·海德(Henry Hyde)等人于范斯坦在2001年5月9日联合提出一项涉藏法案。为使该法案成为法律,国会将其作为《2003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关系授权案》(H.R.1646)的附属内容。在国会议员和全美西藏支持者的支持之下,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于2002年9月30日由总统小布什签署生效。美国政府认为该法案成功地切实可行将行动建议与藏人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兼具计划性和务实性。《2002年西藏政策法》奠定了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基础,也对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责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2年西藏政策法》再次明确规定,在“国务院内部应设立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3]法案特别申明,设立特别协调员的核心目标是“促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之间进行实质性对话”。^[3]协调员的选择须慎重,“在委任特别协调员之前,国务卿应当向主席和国会各委员会有资历的委员进行咨询。”^[3]法案特别明确了协调员的6项其他重要职责,包括:“(1)协调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项目、计划;(2)积极推动制定保护西藏独特宗教、文化、语言和民族认同的政策,促进尊重人权;(3)与藏人宗教、文化、政治领袖保持密切接触,如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区和印度、尼泊尔流亡藏人定居点定期进行考察;(4)就西藏和藏人未来与福祉问题向国会进行咨询;(5)与其他国家外交部长建立联系,为西藏问题寻求解决方法;(6)为完成特别协调员的责任与义务,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来保证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3]“《2002年西藏政策法》确立了美国有关西藏人权、宗教自由、释放政治犯、经济发展计划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建立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度。”^{[1](4)}《2002年西藏政策法》使协调员成为国务院内的永久性职务,其活动逐渐向制度化、公开化、具体化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协调员在人权、经济发展等领域全面介入“西藏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不仅在1959年至1971年支持木斯塘藏人游击队员,直到现在仍然通过《2002年西藏政策法》和任命国务院高级官员担任协调员来把持流亡藏人。”^{[4](134-135)}

“911事件”之后,出于反恐优先战略的考虑,美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逐渐从“撞机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之下,美国国会仍然通过了《2002年西藏政策

法》这样一个旨在加强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的法案,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而且得到了总统的签署批准。这一方面体现了国会保守派议员的政治技巧,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会与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的不同步。

三、“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主要涉藏活动

自从协调员这一职位诞生以来,美国政府共任命了4位协调员。除前文提到的格里高利·克莱格、朱丽亚·塔夫脱之外,副国务卿杜布里安斯于2001年5月17日被国务卿鲍威尔任命为第三任协调员。2009年10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参照布什总统任内的模式,任命负责“民主与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玛丽亚·奥特罗为新一任协调员。他们主要从事以下一些活动:

第一,敦促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对话。按照《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规定,在众多任务中,协调员的核心职责是推动中国政府与达赖或其代表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杜布里安斯基说,“作为协调员,我的工作是确保西藏政策法能够彻底地得到执行。”^[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杜布里安斯基和奥特罗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强调对话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频繁会见达赖喇嘛。

在杜布里安斯基和奥特罗任协调员期间,中国政府与达赖的代表在2002年9月至2010年1月,先后举行了10次谈判。但遗憾的是,双方在长达8年的高层次接触商谈过程中,未能达成任何一致性的意见。

纵观协调员的活动,表面上虽然积极倡导双方进行对话,但其言行却给双方对话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杜布里安斯基宣称“达赖喇嘛已经满足了”中国提出的谈判前提条件,他不鼓吹西藏独立,也没有鼓吹或从事任何分裂活动,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6]因此“中国领导人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他提出的‘中间道路’主张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西藏自治,反对谋求独立。达赖喇嘛是具有崇高影响力和公信力,能够劝说藏人避免使用暴力,接受真正自治来保护西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唯一一人。”^[6]协调员公开站在达赖喇嘛的立场上,鼓吹所谓“中间道路”“真正自治”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所谓“中间道路”源自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国会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不仅要求藏人在文化、宗教等领域实行自我治理,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占中国近1/4领土的“大藏区”,而且中国的军队要撤离大藏区。这些无理要求严重伤害中国的国家主权,

是不可能被接受的,阻挠双方达成共识的症结正是达赖的“中间道路”主张中所包含的隐性藏独的内容。达赖的代表在杜布里安斯基的支持下不断在对话过程中提出上述要求,使接触商谈陷入僵局之中。自2010年1月,双方举行第10次接触商谈、达赖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对备忘录的阐释》之后,由于立场分歧太大,接触商谈陷入停顿状态。

第二,企图联合欧洲议会就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2004年1月,受欧洲议会的邀请,杜布里安斯基访问布鲁塞尔,与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在美欧关系背景下她作为协调员的角色。杜布里安斯基与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调小组联系密切,多次参加该小组的会议。^①2010年11月2日至4日,在赴巴黎和布鲁塞尔访问期间,奥特罗还与法国政府和欧盟官员讨论了西藏问题。

第三,积极参与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并在听证会上作证。协调员多次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等召开的听证会,就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对话的进展情况、西藏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中国境外藏人难民问题、“3·14”事件之后西藏局势问题、《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实施状况等议题发表观点。协调员的证词成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材料来源。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要求对世界范围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年度评估。200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直接援引了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的以“西藏:中藏对话的进展状况”(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为主题的听证会上杜布里安斯基的证词。杜布里安斯基的涉藏活动对《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出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协调员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详细阐释她们对西藏问题的观点。2008年4月21日,杜布里安斯基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西藏的前方之路》的文章。文章不顾达赖集团在西藏从事分裂活动的事实,将“3·14”事件的出现归结为“中国对西藏文化、宗教和其他自由的长期压制”。^[6]由于《华盛顿邮报》是美国的主流媒体,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都是通过媒体的宣传来认识“西藏问题”。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导致美国公众对“西藏问题”的认知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第五,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期间,杜布里安斯基与奥特罗还按照《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规定,自2003年起每年向国会提交双方的谈判报告。历年的报告分为概要、西藏政策、总统与国务卿为促

进中藏谈判已经采取的措施、谈判进展等四个部分,全面记录了当年美国政府的涉藏活动,同时也回顾了自2002年以来双方历次接触商谈的基本概况。此后历年的《谈判报告》内容基本类似。《谈判报告》是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之一。发表此类报告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而协调员则是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人。

第六,关注西藏难民问题。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会便拨款为在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人提供援助资金,通过藏人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就业培训及教育活动。时任协调员朱丽亚·塔夫脱于1999—2000年多次前往尼泊尔对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会见当地的社区、学校及宗教领袖,明确这些以农业为基础的流亡藏民安置点的基本需求,以及如何应对新一代年轻藏人的新的诉求。

由于《2002年西藏政策法》中明确规定,协调员应“与藏人宗教、文化、政治领袖保持密切接触,如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区和印度、尼泊尔流亡藏人定居点定期进行考察”^[3],所以,该法案颁布后,协调员也逐渐加强了对流亡藏人事务的关注。

2006年11月,杜布里安斯基访问达兰萨拉,会见达赖喇嘛,并访问了西藏流亡难民社区。2009年9月,瓦莱丽·贾瑞特(Valerie Jarrett)和奥特罗还会见了西藏难民代表,包括高级官员和前政治犯,两人还参观了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2011年2月7日至14日,奥特罗与部分美国外交部官员和美国驻印度官员,以及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甲日·洛迪和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一起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难民定居点——贝拉库,这是奥特罗第一次访问尼泊尔和印度南部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奥特罗会见了藏族农民、寺院领袖和教师。在尼泊尔奥特罗还与涉藏非政府组织和难民社区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她在访问中赞扬难民定居点在继承西藏传统文化和美德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并强调了美国政府就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

协调员是以《2002年西藏政策法》为依据来干预境外的西藏难民问题的。2011年6月2日,奥特罗委托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Daniel Baer)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主题为《亚洲的宗教自由、民主与人权:〈2002年西藏政策法〉实施情况》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我们实施该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支持西藏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并协助该区域内的藏族难民。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通过各种项目支持西藏、以藏人为主的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藏族难民社区的文化和语言保护、

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此外,国务院的人口、难民与移民事务局(Bureau of Population, Refugees, and Migration)通过持续支持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 UNHCR)对藏族难民提供长期支持。在2010年为南亚的西藏难民(包括新近来自中国的难民)提供了350万美元,支持其接待服务、教育、医疗、用水与卫生设施。副国务卿奥特罗最近视察了我们在印度和尼泊尔的项目,我们通过这些项目协助藏族难民并努力增强其社区。”^{[7](28)}

同时,贝尔还预计,“美国国际开发署印度任务组(India Mission)预期在2011年7月为一个为期两年的新项目提供200万美元补助,用以支持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境内的藏族难民社区。该新项目将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一些藏民安置区开发有机农业,并为留在安置区的藏族青年提供就业培训。美国国际开发署预期该项目将会带来更多经济机会,从而鼓励青年留在安置区,加强社区纽带,保护文化和语言传统。”^{[7](28)}

四、“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影响及角色分析

《2002年西藏政策法》将美国国会、总统、国务院及其他行政部门等各方面的力量协调起来,共同努力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谈判,并由关键人物——协调员进行穿梭外交,加强了美国政府干涉“西藏问题”的力度。自《2002年西藏政策法》签署以来,协调员的活动呈现出以下的作用及影响:

第一,在美国政府的眼中,协调员这一职位非常重要,不可或缺。2001年1月17日,即将担任布什政府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作证时,接受参议员托马斯关于“考虑到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命的协调员在推动中藏对话方面没有取得成功,那么在布什政府中协调员将起什么样的作用”的质询时,鲍威尔回应,“在目前这样的过渡时期,这一职务将起很重要的作用,我在考虑如何任命何人来担任这一职务,他的角色应当是帮助国务院制定能够给藏人和中国人带来和解的政策。”^[8]鲍威尔担任国务卿后,开始精简国务院的机构,裁撤了55个特使、代表、顾问职位中的23个,其中包括伊拉克过渡政府特别协调员、巴尔干和中东特使,但是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务得以保留。这一方面标志着西藏问题在美国决策层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务院认为设立这一职务是有效的。

第二,美国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造成极为恶

劣的国际影响,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纷纷效仿美国,利用“西藏问题”大作文章。澳大利亚参议院也于1997年11月24日通过一项动议,支持美国的行动,并促请澳大利亚政府效法美国设立一个主管西藏事务协调员办事处,指出其主要任务是“加强保障西藏的人权以及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与语言遗产”。1998年,一直高度关注西藏流亡运动的欧洲议会敦促欧洲理事会任命欧盟声援西藏特别代表(EU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ibet.)。^[9]

第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两位协调员格里高利·克莱格与朱丽亚·塔夫脱原来的职务分别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助理国务卿。《2002年西藏政策法》颁布以来,杜布里安斯基和奥特罗先后以负责民主与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的身份兼任这一职务,是1997年设立这一职务以来级别最高的官员。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担任协调员的官员的职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这表明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不断升级,企图通过提升与西藏关系的地位来打压和遏制中国。

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影响力正是通过以杜布里安斯基和奥特罗为代表的高级别国务院官员体现出来的。副国务卿级别的官员在执行美国的西藏政策时有更多的选择手段与机会,如定期接触国务卿,参加高级别美国政府会议,陪同总统访问中国,会见达赖喇嘛等等。一些美国分析家认为,由美国政府高官兼任协调员,这样的双重职务身份也能够保证美国政府有机会在与中国政府的高级别会谈中提到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可能会拒绝接见低级别并且专门负责西藏事务的美国官员。^{[1][7]}

第四,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积极频繁地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进行接触。在全程参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的过程中,杜布里安斯基与中国政府官员、达赖喇嘛及其代表甲日·洛迪均保持密切的联系。杜布里安斯基在2004年至少8次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会面,2007年他们几乎全年都保持接触,主要就与中国政府对话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行前准备、对话策略、对会谈结果的看法等。从2009年8月至2011年6月,奥特罗4次会晤达赖喇嘛,7次会见其代表甲日·洛迪,广泛讨论涉藏问题。通过建立密切联系,协调员不仅对达赖喇嘛代表与中国对话内容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说参与设计了达赖喇嘛代表与中国对话的策略、目标与谈判底线。

在与中央政府进行的第9次谈判中,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备忘录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西藏民族的同一性”,了解“藏人的真正期望”,并从语言文字、文

化、宗教、教育、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经济发展和贸易、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管理外来移民、对外交流等方面全方位阐述了“藏人的基本需求及自主管理”。备忘录中提到“西藏民族在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旨的情况下,得到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地位,并设法通过名符其实的民族自治来解决西藏问题”。备忘录的主旨与协调员的任务完全吻合。很明显,协调员利用自身频繁接触达赖喇嘛及其代表的机会,将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观点与态度渗透给了达赖一方,为其设计了与中国对话的原则和立场。

第五,协调员理应处于公正的立场上,采用协商协调的方式,促进矛盾双方对话沟通,预防并化解争端。而美国国务院设立的所谓“西藏问题协调员”显然未能达到这样的要求。首先,既然是协调“双方”的矛盾,那么协调员的人选理应获得双方共同的认可,协调员的权责才具备合法性。实际上,协调员是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由美国政府擅自设立的。其次,协调员站在偏袒达赖喇嘛一方的立场上,歪曲事实,对中国西藏地区的状况横加指责。杜布里安斯基2008年4月2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表达了她对达赖集团的支持,要求中国停止针对虔诚信教藏人的压迫措施,保存西藏人的文化身份并释放因以和平方式表达观点而被捕的西藏人。她在文章中再度呼吁中国允许所有外国媒体和外交官进入西藏。^[6]2012年初,我国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藏区接连发生了藏人自焚事件,协调员立即对这一事件作出解读。奥特罗于2012年1月24日发表声明,污蔑中国政府采取了错误消极的政策从而导致西藏僧侣自焚。

第六,由杜布里安斯基与奥特罗两位具有移民背景政府高官来担任协调员并非巧合。由于历史原因,冷战结束后,部分脱离苏联集团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同情“藏独”的立场。^②杜布里安斯基的父亲是乌克兰裔经济学家,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活跃分子,曾发起过“沦陷国家周”(Captive Nations Week)运动。她受父亲的影响,是国务院中的新保守派,属于对华强硬派人物。由于其乌克兰裔背景,杜布里安斯基是当时美国政府内东欧苏联问题专家。奥特罗出生于玻利维亚,政府的高度腐败、殖民统治及外国在该国强大的势力导致玻利维亚成为南美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达赖集团在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游说时经常污蔑中国政府毁灭西藏独特的民族特征,破坏宗教自由,为追求经济发展破坏自然环境。这些有移民背景的议员将达赖集团虚假宣传同自身过去悲惨遭遇联系在一起,极易产生对“藏独”势力的同情。因此,这些议员关注“西藏问题”,担任协调员绝非偶然。

五、结语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西藏事务属于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华强硬政客一直试图介入“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作为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重要筹码。为有效地干涉西藏事务,美国国务院设立专门负责“西藏问题”的协调员,加强了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力度,给中美关系的前景增加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协调员出现之后,在国会与国务院之间穿梭活动、上下其手,将各方面反华力量整合起来,以关注“西藏问题”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协调员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其他官员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频繁互动,在支持“藏独”、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支持达赖集团破坏北京奥运会等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协调员的言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更伤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协调员已经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西藏委员会”等组织共同成为美国在国际上支持达赖喇嘛集团的重要力量。

注释:

- ① 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调小组是欧洲议会内部的一个党团组织,成立于1988年,成员均为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议员,主席为托马斯·曼。该小组每月在斯特拉斯堡召开一次会议。
- ② 立陶宛于1995年3月积极主办第二届世界议员西藏问题大会。

参考文献:

- [1] Kerry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R].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9.
- [2] Richard Boyd, Tak-Wing Ngo. State Making in Asia [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2.
- [3] Tibet Policy Act excerpt from H.R.1646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 2003, Public Law 107-228, Sept 30, 2003 [EB/OL]. http://thomas.loc.gov/cgi-bin/cpquery&sid=cp1118FKTw&refer=&r_n=hr136.111&db_id=111&item=&sel=TOC_95205&2003-9-30.
- [4] Steven R. David.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Civil War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M].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 Serial No.110-26 March, 13, 2007 [EB/OL]. <http://www.foreignaffairs.house.gov/2007-03-130>
- [6] Paula J. Dobriansky. The Way Forward in Tibet [EB/OL]. <http://2001-2009.state.gov/g/rls/rm/103860.htm>, 2008-04-21.
- [7]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ligious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in Asia: Status of Implimentation of the Tibetan Policy Act, Block Burmese Jade Act, and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ct, June 2, 2011, Serial No.112-40 [R]. Washington: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11.
- [8]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Secretary of State Designate Powell Expresses Importance of Tibet and Role of Special Coordinator, 17 January 2001 [EB/OL]. <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press-releases/secretary-state-designate-powell-expresses-importance-tibet-and-role-special-coordinator,2001-01-17>.
- [9]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European Parliament Hosts Dalai Lama:Message of Peace and Tolerance Among Nations, 19 October2001 [EB/OL]. <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press-releases/european-parliament-hosts-dalai-lama-message-peace-and-tolerance-among-nations,2001-10-19>.

U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and Their Activities

HAN Lei^{1,2}, XUE Dan¹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2, China)

Abstract: Clinton Administration sets up a position-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in October 1997.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has institutionaliz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whose role has been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Special Coordinators for Tibetan Issues have been playing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DaLai Lama,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ibetan refugee affairs since 1997. U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Chinese inner affairs is reflected in establishing the post of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Key Word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Paula Dobriansky; Maria Otero

[编辑: 苏慧]